

【短史记】

古代赈灾救济救急考

□孙晓明

这次土耳其发生地震，中国除派出救援队，还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，对发生地震的叙利亚加快推进粮食援助项目，体现了大国担当。自古以来，安邦睦邻、悲悯苍生的理念早已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。

民为国之本，民以食为天，历来治国安邦者奉行这个道理。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而首开春秋大国争霸局面的管仲曾说：“王者以民为天，民以食为天，能知天之天者，斯可矣。”民以食为天，国以民为本，“天之天”，便是饮食。

南北朝时代，兵荒马乱，百姓深陷水深火热，公私赈施抚恤，每每有之。这样的事在其他朝代并非没有，但以这个时代尤为突出。北齐卢叔武，官至刺史，迁太子詹事。他生活俭约，一般常食饭粥菜羹，齐灭国后他竟冻饿而死。大概是受其父卢文伟轻财爱客德行的影响，生前他“在乡时有粟千石，每至春夏，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，至秋，任其偿，都不计较。然而岁岁常得倍余”。春夏之交，青黄不接，虽无灾荒有时也会饿死人。卢叔武并不计较得失，而且每年所得还回的粮食，竟是借出去的一倍有余，可见民风之淳朴。

还有北魏官至都官尚书、驃骑大将军的卢义僖，家乡连遭水旱，他以数万石谷子接济平民。结果收成还是不好，他不仅没有让乡人偿还债谷，还当众烧了借契。北齐李士谦也曾“出粟万石以贷乡人，属年谷不登，债家无以偿，皆来致谢。士谦曰：‘吾家余粟，本图赈贍，岂求利哉！’于是悉召债家，为设酒食，对之燔契，曰：‘债了矣，幸勿为念也。’各令罢去。明年大熟，债家争来偿，士谦拒之，一无所受”。李士谦这种无私的行为深深感动了乡亲，在他死后，会葬者达万余人，人们争相为他立碑颂德。

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，政府要开仓赈灾，有时还会强制富人协助政府救助贫民。北魏宣武帝元恪，在延昌元年(512年)五月，“诏天下有粟之家，供年之外，悉贷饥民”，令天下有粟之家，除留下自家维持生活的口粮外，将粮食全部贷给饥民。那一年灾荒太严重，不久皇上又下诏书，“诏出太仓粟五十万石，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”。地方官吏有时也仿照皇帝的做法，在不得已时命富人接济贫人。据《魏书》记载，樊子鹤为殷州刺史，“属岁旱俭，子鹤恐民流亡，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”，贷粟之后局势还真得到了控制。

也有一些富民会主动协助官府，帮助平民度过饥荒。如刘宋人徐耕，曾在大旱之年到县衙陈词，以米千斛助官赈贷，结果受到皇上的称赞，还任命他当平原县令。陈朝出身贫苦的吴明彻，好不容易积攒了三千斛粟麦的家业，他看到邻里乡亲饥荒无食，于是同兄长们商议，把自家的粮食计口分给了乡亲，“计口平分，同其丰俭”。又如刘宋大明八年(464年)，“东土饥旱，东海严成，东莞王道盖各以谷五百斛助官赈恤”。五百斛虽不为多，但救人救命之心可嘉，史籍上还特此记上了一笔。

还要提到的是，一些皇家子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中，以接济贫苦为荣。齐武帝太子萧长懋和次子萧子良笃信佛教，他们建了一座“六疾馆”，专门收养穷苦百姓，有点像现代的难民收容所。梁文帝第八子萧伟，即梁武帝的弟弟，“性多恩惠，尤愍穷乏。常遣腹心左右，历访闾里人士，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，即遣贍恤之……每祁寒积雪，则遣人载樵米，随乏绝者即赋给之”。萧伟如此趋贤重士，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名，四方知名之士纷纷投到他的门下。

萧梁时的皇子们很惯于做这种访贫问苦的事。武帝长子、昭明太子萧统，也就是那位曾辑《文选》三十卷，未即帝位而去世的皇太子，“每霖雨积雪，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，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，以米密加振赐，人十石”。昭明太子已是萧伟皇子的子侄辈，此外，其他子侄也不乏学样的。梁文帝第十一子萧檐之子萧瑛，在任北徐州刺史时，“常载粟帛游于境内，遇有贫者，即以振焉”。

关于政府救灾，古时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，如宋人董煟有《救荒活民书》三卷，追述三代至宋时的救荒史实，也列举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有关言论，如晁错所说：“人情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！明主知其然，故务农桑，薄赋敛，广蓄积，以实仓廩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”又如：“陆贄尝谓，国家救荒，所费者财用，所得者人心。”

得人心者得天下，放粮赈灾，施粥救民，安定人心。明代钟化民，官太常少卿，他根据自己在河南地区救助灾民的做法，写成《赈豫纪略》一书。书中详记官府设立“粥厂”济贫的做法，应当属于较为完备的一种救灾救急方式。

政府的救灾救助，要有得力的官吏实施，否则半路截留、中饱私囊，饥民一无所得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陆续就是一位得力的小吏，“(陆续)仕郡户曹史。时岁荒民饥，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饷粥。续悉简阅其民，讯以名氏。事毕，兴问所食几何。续因口说六百余人，皆分别姓字，无有差谬”。一个小吏，要做到这样是极不易的。同是在东汉时代，献帝兴平元年(194年)大灾，帝命侍御史侯汶“出太仓米豆，为饥人作糜粥”，结果百姓依然大量死亡，献帝怀疑赋恤有虚，“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，乃知非实”，侯汶可能贪污了皇粮，结果被责打了一顿大板。

古代既有不测的天灾，也有长年的兵灾，战乱之苦也须抚恤。明人于慎行《谷山笔麈》卷十六谈到了宋代的一些情况，他说：“宋时，诸路被兵之后，必有一番仇恤。田有践踏者，或赐之粟，民有被掠者，或赐之米，或除其积逋，或收其遗骸，种种抚摩，不一而足。深仁厚泽，固结于人心，良有以也。”于慎行很赞赏宋代的做法，但对明代不重视这一点感到很遗憾：“今世诚考其法，于边境中虞之地仿而行之，于公家无费，而可以收拾人心，培养元气，惜乎无举而行之者。”



老舍教老外说中文

□关山

作家老舍一生不仅著作颇丰，还有着近三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，在英国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更是其域外经历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。上世纪20年代，老舍先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部教汉语，其间参与编写了一套汉语留声机唱片教材——《言语声片》，这也是我国对外进行汉语教学最早的一套系统有声教材。

1924年，25岁的老舍远赴伦敦，开始了其鲜为人知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，为期五年。这五年，是老舍走向文学创作之路、成为文学家的关键阶段，《老舍的哲学》《赵子曰》与《二马》等小说大部分都是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安静的图书馆里完成的，同时他在东方学院先后担任“中文讲师”“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”，给中国语文系的学生教授汉语口语、翻译、古文和历史文选等，还和同事合教过道教佛文选、写作课。

在散文《东方学院》中，老舍详细记录了他的中文教学情况，其中对学生是这样描述的：“到这里来的学生，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。以年龄说，有的是七十岁的老夫或老太婆，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。只要交上学费，便能入学。于是，一人学一样，很少有两个人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。拿中国语文系说吧，当我在那儿的时候，学生中就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：一位老人是专学中国字，不大管它们都念作什么，所以他指定要英国的讲师教他。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学，因为他非常注重发音；他对语言很有研究，古希腊、拉丁、希伯来，他都会，到七十多岁了，他要听听华语是什么味儿；学了些日子华语，他又选上了日语。这两个老人都很用功，头发虽白，心却不笨。这一对老人而外，还有许多学生：

有的学言语，有的念书，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，有的念元曲，有的念《汉书》，有的是要往中国去，所以先来学几句话，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而想深造……总而言之，他们学的功课不同，程度不同，上课的时间不同，所要的教师也不同。这样，一个人一班，教授与两个讲师便一天忙到晚了。这些学生中最小的一个才十二岁。”

在这期间，老舍(C.C.Shu)和英国人布鲁斯(J.Percy Bruce)教授、爱德华兹(E.Dora Edwards)讲师合作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汉语留声机唱片教材——《言语声片》。老舍负责中文部分的编辑工作，书中的课文、生词部分的汉字全部由老舍手写，全书的课文和生词也由老舍录音。

编教材与写小说有很多共同点，但也有不少差异。为了更好地编写教材，老舍通过读英国小说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。而英国幽默文学传统历史悠久，有许多名家名作，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狄更斯，他的小说给老舍的教材编写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一本教材的内容完全靠自己编写是很难的，在博采众家的同时，架通中英文语言的桥梁，是老舍的初衷。老舍除了对英国小说的大量阅读，还有计划地搜集语料，到各种实际场景中去搜集、整理，进行中英文化对比，并且进行大量的教材阅读，进行语言材料的整理与储备。在老舍和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，不断进行情景模拟和文化融合，《言语声片》教材终于成功完成。

资料显示，唱片的出版发行在1926年左右，唱片共16张，32面，其中15张录了30课课文，第1张作为序篇，是发音练习，录有两段作品，一面是伊索寓言《酸葡萄》，另一面是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五回片断。每

张唱片都装有灵格风的套封，上面注明发音灌录者的全名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Chien Chun Shu，也就是舒庆春。由出版说明中可以看出，从分工上看，老舍负责第十六课下到第二十七课下的对话课文撰写，及第二十八课上、下到第三十课下下的全部课文撰写，大体占全部第二卷汉语课文页数的43%，从发音内容量上则占60%以上，而且是较为复杂的课文部分。十五课以前的课文内容比较简单，是字和词的发音，以及一些简短的句子，不构成专题的内容。从老舍负责的第十六课起，会话部分都有题目，是一个一个专题，共15个专题，诸如“火车站”“游戏”“商业谈话”“新闻”“洋服庄”“银行”等等，其中有一些专题不光语言生动，内容也很新颖，传递了作者的一些思想和主张，譬如第二十一课下，题目是《看小说》，有如下的内容：“甲：……我近来看小说的瘾非常得大。说真的，近来出版的小说实在比从前好得多。因为新小说是用全力描写一段事，有情有景，又有主义。旧小说是又长又沉闷，一点活气没有。况且现在用白话写，写得生动有趣，你说是不是。乙：是，我也觉得新小说有意思，因为有一些文学上的价值。”

经过老师教学，那些学生的中文水平大有长进。老舍在《东方学院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帮助考过他们，考题很不容易，言语，要能和中国人说话；文字，要能读大报纸上的社论与新闻，和能将中国的操典与公文译成英文。学中文的如是，学别种语言的也如是。厉害！”《言语声片》流行于上世纪20—40年代，后来被一套香港出版发行的新灵格风汉语教材取代，不过后者的水平明显不及其前身。

“当时他25岁，声音很清亮，音调比较高，不像晚年的声音那么低沉，但是，一听就知道是舒庆春的声音，标准的北京音，很漂亮，清脆好听。”1994年，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将一套完整的《言语声片》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根据这一套资料，《言语声片》教科书第一卷和第二卷才得以完整地复印到了《老舍全集》第19卷中，而他的声音作品也根据唱片录成CD光盘，听众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听到。舒乙先生曾评价，这部《言语声片》不同于一般的汉语教材，其特点包括：内容针对成年人，而不是针对儿童，并非小学教材，是成人教材，涉及内容广泛，具体而细致，很有实用价值；语言内容主要取材于北京，而不是其他地方的，但又全国适用；课文内容为现代口语，并不刻意讲究所谓文法，以习惯语气为主，语句都比较短且朗朗上口。百年间，北京话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，《言语声片》中有一些说法和用词，现在已经很陌生了，成了“过去式”。因此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，这部教材成为珍贵的语言文化史资料，老舍先生也成为在海外传播汉语教学的鼻祖之一。

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